

◀ （上接3版）

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由此可见,蒋学模在这方面是幸运的。更为幸运的是 1950 年到 1952 年夏得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人大是我党最早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当时能进人大学习,听从苏联专家讲课,可谓一种殊荣。[据吴起民、耿化敏:《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立(1949—1957年)》,1950年6月至1951年10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的苏联专家有阿尔玛佐夫(1950年6月至1953年5月)、耶里莫诺维奇(1950年7月至1957年6月)、然明(1951年3月至1954年7月)和焦莫什金(1951年10月至1953年6月)(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64页)]当年蒋学模只有32岁,据有些老师讲,与其他一些年轻学员不同,他那时已经是讲师。在人大两年学习期间,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著书立说,先是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讲话》,1952年在开明书店出版,后又补充进一些新的内容,以同样的书名在青年出版社出版。蒋学模后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大名鼎鼎”,其实在那时就已经鼎鼎大名,要知道那可是在解放初期。

不仅在人大取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历,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赏识。1955—1956年,蒋学模与方方(王慧德)、陈道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学术杂志出版社,1956年出版),据说毛主席给予称赞,并于1957年7—8月间接见了蒋学模,“可以说,蒋先生很早就红极一时、名声远播”(周秉腾:“沉痛悼念蒋学模老师”,《特区经济》,2008年第7期)。蒋先生在《对话》中曾将《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经济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列入主要著作清单,并专门介绍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的情况。[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第139页、181页、148—154页]由此可见蒋先生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界的地位。

蒋先生在全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影响还体现为,在原国家教委的倡导下,共同创办设立了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85年,北京大学(主要代表人物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

涛教授、卫兴华教授)、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谷书堂教授)、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曾启贤教授)、吉林大学(关梦觉教授、张维达教授)、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等8所部直属大学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同时,参加筹备成立研讨会的还有两所地方综合性大学:辽宁大学(首任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教授)、黑龙江大学(副校长熊映梧教授),与会成员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余学本教授、北京大学陈德华教授等。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三大会之一。(孙咏梅:《卫兴华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141页)在此期间,宋则行教授曾多次参与研讨会,与各位学者友谊深厚。宋则行尊称宋涛为“宋老”(其实宋涛只比宋则行年长三岁),宋涛则称宋则行为“小宋”。记得有一次在山东大学开会,会后集体登泰山,“宋老”一直冲在最前面,“小宋”等一行人紧随其后,弟子们众星捧月般跑前跑后,在南天门形成了一道风景线。也正是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我有幸当面结识了仰慕已久的蒋先生,并与先生在昆明的世博园合影留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著名经济学家

蒋先生曾说过,自己最看重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基督山伯爵》,另一部是《政治经济学教材》,并戏称,这两本书可以代表他的一生。搞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最具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首屈一指是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类是文科和财经类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本”,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主编的“南方本”和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主编的“北方本”。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全国渴望政治经济学教材(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的形势下,这两类教材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人的成长。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1978年6月,在国家教委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工作座谈

会上,与会各校政治经济学专业人士纷纷呼吁组织编写适合专业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经过酝酿讨论,北方和南方有关高校商定分北片和南片进行协作编写社会主义部分教材。南方院校16所大学由复旦大学蒋家俊教授、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担任主编,史称“南方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1979年9月出版第一版,1986年修订出版第四版(见洪远朋、曾天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四版评介》,《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第79页转第7页)];北方13所高校由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担任主编,辽宁大学章宗炎教授、南开大学朱光华教授担任副主编,史称“北方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12月出版第一版,1995年参编单位扩大至北方14所高等院校,2009年第九版扩大至全国39所学校。从1979—2013年共出版了10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82年修订本后记”、“1995年修订本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十版,第198—199页、204页;2009年版“前言”,第1—3页]

1979年夏,国家教委政教司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拨乱反正的要求,组织一部分高校教师集中到北京编写三门政治课的教学大纲。蒋学模任政治经济学教材大纲编写组组长。两个月后,编写出《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高校试用和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委托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大纲编写教材,主要供理工农医和部分文科系科作为政治理论课使用的教材,财经系科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则另有安排。[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第171页]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全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从1980年至2005年共出版13版。

由于我本人1988年到2013年一直参加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的编写修订工作,前后历经25年,通过比较“北方本”与“蒋学模本”,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这两部教材都是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顺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这两部教材都坚持编写了相当长的时间,社会



蒋学模曾在复旦大学《文摘》担任编委,并在上面发表了不少翻译文章。



主义“北方本”前后历经35年,大体每三年修订一次,“蒋学模本”前后历经25年,大约每隔两年修订一次;三是教材的适应面比较广,社会主义“北方本”除用作全国文科和财经类教材用书,1986年起还被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高等教育财经类自学考试用书,“蒋学模本”除作为理工农医和部分文科科系政治理论课教材外,还得到国家教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推荐;四是发行量都比较大,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79年至2003年发行逾150万册,这在全国专业类教材中似不多见,“蒋学模本”作为政治课教材更是创“天量”发行纪录,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估计在世界教材发行史上也有一拼;五是都获得了一些重要奖项,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88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1992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蒋学模本”曾获得1997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国家教委一等奖、1995年和1999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除此之外,我觉得在两部教材编写过程中还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之处:一是主编的个人魅力,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历经35年长久不衰、队伍不散、成果不断,主要得益于两位主编的精诚合作和互相支持。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佳话:从年龄上,宋则行比谷书堂年

长8岁;从资历上,宋则行1941年入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1948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会员,谷书堂1946年入南开经济系学习,1950年留校任教,但宋则行一向为人谦和,做人低调,对母校南开一往情深,对谷书堂尊重有加,谷书堂也尽显大师风范,敬宋则行为师长,凡事均与他商议。正是两位经济学大家的博大胸襟和情怀,遂使“北方本”教材编写顺利,编写组气氛和谐。(林木西:《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辽宁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9页)相比而言,因“蒋学模本”主要由复旦一家承担,似乎合作相对容易,但主编责任重大。据蒋先生回忆,第一版由9个人编写,初稿写得很快,但主编统稿任务繁重,历经一个多月时间才交付出版。从第二版起,主要和伍柏麟两人负责。[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蒋学模教授),第172页]也正是由于蒋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遂使教材与时俱进,不断生辉。

二是大师风范,甘为人梯。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促进队伍建设,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促进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我本人从中获益匪浅。我1978年入学、1982年读研究生,学的都是政治经济学,从1982年起担任宋先生的